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过程新论

孙玉芹, 李慧娟

(河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2)

[摘要]社会主义改造行将结束之际, 第一代中央领导成员就如何走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开始了积极的思考。他们提出的很多想法主张不仅为1978年以后的改革提供了先导、启示, 更有不少内容直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事实上, 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已经开始萌芽。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形成发展过程; 第一代中央领导成员; 萌芽

doi: 10.3969/j.issn.1673-9477.2014.03.017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14)03-061-05

2007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大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进行了科学整合。随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过程迅速进入了人们的研究视野。目前已发表相关论文10余篇, 其中不乏党史大家之作。然仔细读来, 发现不少值得商榷之处, 最为突出的问题是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起点。囿于党的文件的相关表述(并非纯粹学术意义上的), 以往论者谈及该问题几乎总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 这是非常不妥的。事实上, 自1956年初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已经开始萌芽。

如所周知, 早在1956年4月,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就已经清晰地表达了这样一个基本思想: 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学习别国长处, 借鉴他国经验, 走自己的路, 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与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所宣告的“走自己的道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比, 两者尽管在文字的表述方面存有差异, 但在思想内涵上并无太大的区别, 甚至可以说, 后者是对前者的高度概括和提炼。围绕毛泽东提出的这一基本思想, 第一代领导成员开始了艰辛的探索, 并取得了很多积极的成果。

一、揭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并系统阐述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

1956年9月27日, 中共八大通过了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的决议。该决议明确宣告: 今后“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 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 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 (P248)}对比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 81

决议)的相关判断: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 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 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2] (P63)}通过比对不难发现, 81决议实际上是恢复了25年前八大时的判断, 不过是在文字表述上略有差异而已。如今, 距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已经30多年, 尽管学术界有不同的声音, 但党的文件、党史著作和各级各类政治课教材对该问题的表述一直未见丝毫的改变。

1957年6月19日, 《人民日报》刊发了年初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该文着重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的两类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 尤其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表现、相互关系、处理方针和解决方法。毛泽东指出: 矛盾是普遍存在的, 要敢于公开承认; 人民内部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 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也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日益巩固; 和旧社会, 如资本主义社会所不同的是,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毛泽东同时指出: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 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还很不完善, 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也还存有缺陷; 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明确提出并系统地阐述社会主义社会矛盾, 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尚属首次。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重要论述也为1978年以后的改革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和方法上的指导。

二、提出了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思路

1956年4月,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 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 适当加重农业、轻工

[投稿日期] 2014-04-10

[作者简介] 孙玉芹(1972-), 女, 河北遵化人, 副教授, 历史学博士, 研究方向: 民国时期的教育军事与毛泽东思想。

业的投资比例。毛泽东还根据国际形势趋向和缓的有利条件,提出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并适当地降低军政费用的比例以加快经济建设。随后,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把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上升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关于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中共中央在1956年6月初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随即得到了八大的肯定。八大以后新一届中央领导人反复强调要增强改革的整体性、协同性,要坚持“稳中求进”、“稳中有为”的工作方针,这样的要求既符合中国人的思想传统,也与中国这个大国的国情相适应。此外,毛泽东还在1958年提出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它同样是具有长久意义的指针。

经济体制改革当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中央与地方的经济管理权限问题,毛泽东不止一次地提出,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下放一点权力,让地方办更多的事,以利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二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经营管理模式问题,邓子恢强调指出,要调动社员积极性,必须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首先是包工,“要按照作物的特点来规定包的办法,有的包到组,有的包到户,有的包一年,有的包几年,造林就要包几十年”。^{[3](P605)}邓子恢还明确表达了对包产到户的看法:“单庄独户、离村庄远的就包产到户,或者让他们单干^{[3](P589)}”;“有些技术性较强的作物,如南方的茶叶,东北的柞蚕等,也可以包产到户”。^{[3](P613)}陈云则在中共八大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设想。邓小平甚至认为,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判定形式好与不好,要看它是否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4](P323)}这与1992年初其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的“三个有利于”中的第一条颇为相近。在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错误时毛泽东提出了利用价值法则、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思想。这些观点主张无疑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理论的重大突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在初始阶段,无论指导思想、还是改革路径、具体措施,和此前的探索非常相近。

三、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几点设想

八大前后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思想主要有:

(一) 中国既不搞苏联式的一党制,也不实行西方的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制,而是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

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关系是执政党同参政议政党的关系,而不是执政党同反对党的关系,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二) 扩大民主,反对官僚主义

中央领导同志对社会主义国家扩大民主生活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作了深刻的阐述,并从改革国家具体领导制度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主张。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明确宣布:“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为其时我们国家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必须精简国家机关的组织机构并明确规定每一位工作人员的责任,还要定出中央、省、市各级国家机关各部门负责人经常深入下层、了解下情、检查工作、倾听意见的具体办法,同时还要督促他们严格加以执行。其时国家工作中的又一重要问题,也与扩大民主生活、克服官僚主义的要求相关,是适当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反对由中央包揽国家的各种事务。^{[5](P248-249)}

(三) 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中国法制

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斗争的方法必须随之改变。“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为我们国家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5](P253)}

董必武还在八大上就加强法制建设做了系统的发言。董必武认为,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环节是依法办事。他还就如何加强人民民主法制提出了几条具体措施:党必须注重法制思想教育,必须迅速建立法学研究所,必须改进政法学校的教学质量,必须配好一般高等学校法律课的教员,必须通过广泛的法律宣传教育工作培养守法的社会风尚。除加强改进法制思想教育外,党还必须适当加强司法机关的组织,尤其要适当加强检察机关的组织,即编制足额且较精干的人员;同时要加速推行律师制度和公证制度,公断制度也应该逐步建立起来。^{[6](P262-263)}董必武的发言内容充实具体且极具创见性,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法制建设提供了切实的指导。

(四) 正确处理少数民族问题,促进民族繁荣和社会改革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都在他们的文章和讲话中反复强调: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和

地方民族主义，特别要注意反对大汉族主义；要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少数民族地区的改革必须稳妥地、从容地，而且要以和平的方式进行，充分理解和尊重少数民族群众和公众领袖人物的意愿；必须尊重民族自治权利，重视民族化问题。后者具体表现为：尊重民族的语言文字；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5] (P250-252) ; [7] (P33-34, 227) ; [8] (P268-270)}以上这些要求和政策上的相关规定，在当前乃至未来依然是党和政府在民族和宗教方面的基本遵循。

（五）防止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员成为特殊阶层

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刘少奇首先尖锐地提出了这个话题：鉴于若干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国家的领导人员有可能成为一种特殊的阶层，特殊的“统治阶层”，如果不注意而让其自流，我们国家也可能产生一种新的“贵族阶层”。为此，刘少奇提出加强人民群众对领导机关的监督并使之制度化、限制国家领导人员的权力、国家领导人员的生活水平不能同人民的生活水平过分悬殊、领导干部要能官能民等防范措施。^{[9] (P94-95)}

毛泽东还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了判断我国人民言行是非的6条政治标准。在这6条标准中，毛泽东强调，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1979年3月，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必须遵循四项基本原则，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而今，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这两项原则依然是我们反复强调的。

四、关于思想文化建设的基本思想

（一）发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工作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对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和培养大批双高知识分子（业务水平和政治觉悟）的极端重要性紧迫性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他指出：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加需要提高生产技术和发展利用科学知识；科学对于国防、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1963年1月，在上海科技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更加明确地指出：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8] (P159; 181)}基于上述认识，在1956年党的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中央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并提出了加强全面规划、分清缓急本末、打破近视倾

向，以尽速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的发展思路。^{[8] (P182-183)}1960年代初，又制定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科技发展战略。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科技发展正是循着这一方向进行的。

（二）提出了繁荣科学艺术的16字方针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7] (P54)}同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确认了这八字方针，并进而指出：科学上的真理愈辩愈明，艺术上的风格必须兼容并包；对于学术以及艺术性质的问题，要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党不应当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5] (P239)}几个月后，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再次表明党在艺术科学问题上应当秉持的态度。1964年9月，毛泽东又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

五、加强执政党建设的若干思考

在党的八大会议上，邓小平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报告揭示了执政党面临的新考验，并深入阐述了坚持群众路线、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的重要意义及具体措施。

报告认为，要贯彻群众路线，克服官僚主义习气，党除了应切实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外，还必须从体制改革入手，如系统改善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方法，使领导机关的工作人员有足够的时间深入群众；缩小领导机关和领导层次，领导机关的工作人员须亲自处理实际工作；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使党和政府的下级组织可以及时并无所顾忌地批评上级机关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使党和国家的各种会议成为充分反映群众意见、开展批评和争论的讲坛；加强党和国家的监察工作，以及时发现并纠正各种官僚主义现象等等。^{[4] (P223-224)}这些声音虽然是在半个多世纪前发出的，但时至今日，依然振聋发聩。

八大通过的新党章增加了一些关于发展党内民主、保障党员权利的规定。新党章还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他准备到适当时候不当党的主席的要求，增加了于必要时加设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1人的内容，实际在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作准备。^{[10] (P238)}新党章还首次规定：全国、省一级和县级的代表大会都改作常任制。这是加强党的民主建设的又一重要举措。“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这一规定一直延续至今。

毛泽东则多次强调，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的

政治本色,要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始终保持革命热情与拼命精神,不争名誉和地位,不比薪水、吃穿和享受;要求干部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摆架子、不摆资格,平等待人;^{[7] (P162、284、378)}共产党要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于官僚主义现象,毛泽东也是深恶痛绝。他指出:“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要求各地积极创设条件,反对官僚主义,克服“五多五少”。“五多五少”是: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的时间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11] (P166-167)}对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要少讲空话,多讲办法。^{[12] (P143)}

周恩来要求领导干部要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周认为,各种关系各种事物都会影响个人的思想,因而“要经常反省,与同志们交换意见,经常‘洗澡’。要把思想改造看成像空气一样,非有不可”。^{[8] (P425)}过政治关,最重要的是立场问题,立场究竟稳不稳,一定要在长期斗争中才能考验出来,还要看工作态度、政策水平、群众关系和党性。过社会关就是注意不被各种落后的习惯势力、坏习气所影响、沾染和侵蚀。过亲属关,不只直系亲属,还有本家、亲戚,“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过生活关,在物质生活方面,“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8] (P423-427)}

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其不少要求和具体做法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关于执政党建设的若干主张相近,就连语言风格方面都有某些相似之处。

六、其他方面的主张

关于祖国统一的设想。1956年1月,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发出了“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的号召。他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宣布:凡是愿意回到大陆省亲会友或参观学习的,都可以到大陆来。凡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咎既往。^{[8] (P499)}同年6月,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再次陈明处理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不咎既往

和立功受奖等。^{[8] (P202-203)}

在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错误和国民经济调整的过程中,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不能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8] (P349); [11] (P233)}上述要求同样也是胡锦涛任总书记时以及十八大以后新一届中央领导人反复强调的,尽管语言表述和风格上有些差异,但在思想路线和工作要求方面几代领导人是一贯的。

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宣布,争取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即20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战略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毛泽东时代也已经确立下来了。

综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第一代中央领导成员的探索涉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建设的方针原则、发展战略、执政党自身建设等各个方面,探索的很多成果不仅为1978年以后的改革提供了先导、启示,更有不少内容直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应当把改革开放前20年的探索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之中。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第24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3]邓子恢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4]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5]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6]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Z].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 [7]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8]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9]朱乔森等.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研究[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 [10]郭德宏.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
- [11]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 王云江]
(下转第92页)

个自信、有知识和能力、有历史和文化的高大形象。在剖析人性的丑陋方面，老李比貌似文明的西方人更文明和宽容。他博览群书，涉猎广泛：心理学、哲学、宗教、文学、医学等等。相对于塞缪尔，老李在《伊甸之东》这部作品中可以说是个真正灵魂式的人物，甚至对于塞缪尔也起着精神引导的作用。他不断探究事物的真相，从而在根本上解决了如何用“善”来制服“恶”，通过“你可以”这个具有恒久意义的问题获取灵魂的救赎。老李的哲学思想像一束阳光照进特拉斯克家庭，他以崇高的品质和敏锐的观察力帮助亚当度过被卡西抛弃后的痛苦岁月，引领亚当回到健康的生活轨道。他就是西方文明的救赎者，他在实现自己的自由意志的同时，成功指引和拯救了美国人失落的精神世界。

参考文献:

- [1] (美) 约翰·斯坦贝克. 伊甸之东[M]. 王永年.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 [2] 田俊武. 作为精神先知和家庭奴仆的老李[J]. 广西大学学报, 2006(10): 72-75.
- [3] 刘岩. 中国文化对美国文学的影响[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9.
- [4] Bedford, Richard C. "Steinbeck's Use of the Oriental." *Steinbeck Quarterly* 13 (1979): 5-19.
- [5] Timmerman, John H. *John Steinbeck's Fiction: The Aesthetics of the Road Taken*.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86.

[责任编辑 王云江]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American-Chinese Lee in *East of Eden*

ZHANG Shu-ju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213002, China)

Abstract: In *East of Eden*, Lee, American Chinese, who well understands and acknowledges the fact that the Chinese suffer the racial discrimination in America, establishes a new moral system with his own wisdom and philosophy and is well accepted by the American society. He wins his personal triumph by subverting the traditional character which has become the stereotype and prevailed for a long time in the western cultures. By analyzing Lee's profound philosophy of life, his optimistically confronting history and sins, his interpretation and practice of free will, Steinbeck tries to help the American construct a new moral system with the aid of Chinese culture and help the American out of the spiritual dilemma.

Key words: *East of Eden*; character; free will; the spiritual dilemma

(上接第 64 页)

New study 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ing process of the socialist theoretic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UN Yu-qin, LI Hui-juan

(Marxist College of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China)

Abstract: when the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will be over,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central leadership tried to find out a suitabl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road in China. Their exploration not only provides enlightenment and become precursor of the reform after 1978, moreover, many substantial content directly become the organic content of the socialist theoretic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socialist theoretic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begun before 1978.

Key words: the socialist theoretic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process of formation and developing;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central leadership; germinating